

郭光校注

中州名家集

阮籍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中州名家集  
**阮籍集校注**  
郭光校注

---

责任编辑 王鸿芦

责任校对 孙宝瑞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32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ISBN7—5348—0383—7/1·184 定价:8.5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重辑、重校、详注三国魏大文学家、思想家阮籍的专著。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为当时有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是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州作家。因曾官步兵校尉，世又称阮步兵。他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不满现实，故纵酒谈玄。他的诗文即反映了这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总结了魏室衰亡的历史教训。《咏怀诗》抒写自然，无雕琢的痕迹；但辞采多暗淡，诗意甚朦胧。晋陶渊明就深受他的影响；李商隐的诗也显然与阮诗有着血缘。阮籍的文章更有自己的独到特点。《大人先生传》写一非礼教的理想人物以寄托他的“胸怀本趣”，在哲学观上也有着进步意义。阮籍是个值得研究的作家，故现在全面、系统地整理他的诗文，加以注释，后附阮籍年谱，以供学习、研究者参考。

## 《中州名家集》编辑说明

河南省地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今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选择地整理研究这批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州名家集》。

本丛书收录范围以古代河南籍中较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长期寓居河南的作家的名著。有些大家虽属收录之列，因其著作在建国后已有较完备的整理本出版，为节省人力物力，本丛书一般不再收录。本丛书所收以文学家的著作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社会学科的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概不收录。

本丛书所收著作，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作认真的校订并加新式标点和必要的笺注，以为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研究和阅读的本子。

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能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3月

## 论阮籍及其诗(代序)

阮籍，三国魏时期的大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瑀之子，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为“竹林七贤”之一，其人其诗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生于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卒于魏少帝曹芳景元四年(公元263)。他的仕宦生涯是从齐王芳即皇帝位，太尉蒋济辟为属吏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是在魏室逐渐走向衰亡，权臣司马懿父子的政治力量逐渐强大的魏三少帝(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时期。阮籍的父亲阮瑀，知名于世。魏太祖曹操以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瑀所作。”后徙仓曹掾属，受知遇于曹操。所以阮籍从他父亲以来，对魏室有深厚感情。他的政治态度是忠于魏室。可是司马懿在嘉平元年(公元249)正月诛杀魏之肺腑大将军曹爽之后，已摧毁了魏室的政治军事力量，自为丞相，开始篡权专政。继而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司马昭又弑高贵乡公髦，立常道乡公奂。司马氏大权在握，任意废立。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趋炎附势之徒，不顾顺逆之理，竞相攀附。司马氏篡弑之势已成，禅代已不可免了。

阮籍本有济世志，也思有所作为。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夺

权力量，他既无力积极抗争，扭转魏室的败局，便流于消极反抗。他说过“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咏怀诗》其三十五）。诗意在有所争，思有所作为，但因利剑不在手，最后又归之于乌取争。表现了阮籍在强大的司马氏夺权力量面前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所以他的处世态度：

一是不与世事，即不和司马氏合作。“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嘉平元年正月何晏等名士（《世说新语》卷二《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刘氏注云：“宏〔袁彦伯名〕以夏侯太初〔名玄〕、何平叔〔名晏〕、王辅嗣〔名弼〕为正始名士。”）被司马懿所杀后，嘉平三年，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居山阳（在今河南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共为竹林之游。游竹林，正表现了他对司马氏篡弑力量的不满。“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翱翔观陂泽，抚剑登孤舟。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咏怀诗》其六十三）陂泽即是在河南修武县北一十里的吴泽陂，为竹林七贤游赏之地。这首诗作于正元二年任步兵校尉之时。“观陂泽”意在忘忧虑；“抚剑”意在有所作为；“长闲暇”表现了对“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的厌恶；“复来游”为对水乡的留恋。其中透露了对司马氏的不满。

二是嗜酒放达。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谓得大道之本。”（《世说新语》卷一

《德行》注引)可见其嗜酒放达的情况。但阮籍嗜酒而诗中却不言酒,自己放达却不愿其子弟放达。《晋书·阮籍传》:“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阮咸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同书《阮咸传》:“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可见阮籍对嗜酒放达认为都不是好事。他把吃酒当做忘忧的手段。如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最早造酒的人,所以用杜康代酒。酒对人是一种麻醉剂,吃了之后,可以麻痹知觉,因此,阮籍把吃酒作为遗落世事的手段。用醉酒的方法,超脱於政治的是非之外,以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如“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阮籍反对司马氏父子的欺人孤寡的阴谋篡弑行为,不愿与司马氏联婚,但又不敢明白拒绝,只有用一醉六十日的方式蒙混过去。又如擅长进谗言的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由此可以看出阮籍嗜酒放达的真正用意所在了。

三是口不臧否人物。阮籍的仕宦,一直是处于司马氏势力的监督之下。如他初为太尉蒋济属吏(蒋济是司马党人,参与了司马懿的谋杀曹爽),以后司马懿又命他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又为司马师大将军从事中郎;司马师死后,

又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中郎。可见他的任职，一直是在司马氏父子身边的。而他的内心深处又是忠于魏室，反对司马氏父子的。这样，他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他说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特别是在司马昭辅政之后，斗争越来越激烈，发展到高贵乡公曹髦被弑的地步，阮籍也常恐遇祸。所以他平生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也不评论时事，以求远祸，保存自己。如“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言皆玄远，即发言不接触现实；未尝臧否人物，即不评论人物，说人好坏。嵇康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司马党人何曾之流）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司马昭）保持之耳。”（《与山巨源（涛）绝交书》）嵇康也钦佩阮籍口不论人过而自愧不能。他好直言，《与山巨源绝交书》注引《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恶焉。”（见《文选》卷四十三）非薄（商）汤、（周）武（王），即意味着反对司马氏的篡弑革命，因此遭杀身之祸。足见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用心之所在了。

四是反对虚伪的礼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人讲礼法。汉末天下大乱，儒术说教，不足以维系人心。而礼法适为奸雄所利用，成为诛杀异己的工具。如曹操自己反对礼法，他在建安十五年《求贤令》说“盗嫂受金”的人，也

可录用；但他却以“非孝”罪诛杀了孔融。

到了魏正始时期，玄风兴起，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玄，指宇宙本体，本体为绝对的，礼法是人造的。所以玄流蔑视礼法，认为人为的无价值。阮籍受了王弼、何晏思想的影响，尤好《老》、《庄》，而又身事乱朝，感富贵荣华不常在，所以也追求绝对，追求常住、不变。他感叹说：“自非凌风树，憔悴乌有常？”（《咏怀诗》其四十四）这是就哲学思想来说的。就政治思想来说，当时司马氏父子也是反对礼法的。因为礼所以别尊卑，礼法的核心是忠孝。即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司马氏父子搞阴谋篡位，这是不忠于其君的反礼法行为。而司马昭却以反礼教罪诛杀了嵇康，也是用礼法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足见当时礼法的虚伪性了。又如当时礼法之士何曾之流，不顾顺逆之理，党附司马氏，用礼法作为攀附的手段。“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司马昭）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孙盛《晋阳秋》说：“何曾与太祖坐谓阮籍曰：‘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变革，王宪岂得相容？’谓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与山巨源绝交书》注引）这些人正如阮籍指出的“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大人先生传》）足见当时

所谓的礼法之士，是一些以礼法为幌子的利禄熏心之徒了。阮籍胸怀淳正，任性自然，他的反对礼法，实为有所激而使然。“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籍传》）这是反虚伪的礼教的宣言。其实，阮籍是最讲礼法的。他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其十五）颜闵是孔子的弟子颜渊、闵子骞，以德行著称。他是以颜闵相期许的。他又性至孝，母死，哀痛出自内心。“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脊骨立，殆至灭性。”与孔子所批评的“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的流俗之士迥然不同。而他一生行事，又是忠于魏室，反对司马氏阴谋禅代，这些都可以作为他讲礼法的佐证。晋人《梅子新论》说：“阮籍孝尽其亲，忠不忘君，明不遗身，智不预事，愚不乱治，自庄周以来，命世大贤，其唯阮先生乎？”（见《玉函山房辑佚书》）

阮籍虽然忠于魏室，但有时慑于司马氏的力量，不敢坚持。如曹爽与司马懿同受遗诏辅少主，但曹爽认为司马懿有大志，而又深得民心，所以不能推诚相待，授以大权，常常猜忌提防。司马懿则以曹爽是魏之肺腑，力不能争，且惧其祸，遂称疾避爽（《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可是司马懿不甘心失败，进行反攻，势在必然。当时有识之士都能看到这一点。如虞预《晋书》说：“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踏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司马懿）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

‘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世说新语》卷二《政事》注引）阮籍也看到曹爽和司马懿的斗争，意识到司马懿终要取得胜利，魏室力量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当“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於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晋书·阮籍传》）。在魏室与司马氏两种力量决战的时刻，阮籍没有站在曹爽一边，这是他的可议之处。又如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命籍为从事中郎”，阮籍到职，显然也是畏法而就职的。“司马景王（司马师）东征（毋丘俭），取上党李喜（字季和）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司马懿）辟君不就，今孤（司马师自称）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世说新语·言语》）阮籍和李喜在“畏法而至”这一点上是同一类型。又“嵇中散（康，为中散大夫）既被诛，向子期（名秀）举郡计（应岁举）入洛。文王（司马昭）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巢父、许由隐于箕山），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说新语·语言》）。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也向司马氏低头，远祸保身。这是当时“名士”“诸贤”的共同弱点，阮籍也没有例外。所以阮籍感慨地说：“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咏怀诗》其五十）在司马氏篡弑力量强大，如严霜杀物的严酷情势下，明智之士也竞相攀附，华草成为蒿莱。即是心存魏室的贤君子，如竹林七贤人物，行事也难以做到明智通达，守正不阿。其中也有自

责之意。

阮籍诗，现存的有《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四言三首，五言八十二首），歌两首，反映了魏晋易代之际的生活和斗争。

他的诗首先反映了在魏晋易代之际的忠于魏室的力量和司马氏篡弑力量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在魏三少帝时期。魏明帝曹睿临死前，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齐王芳。托孤之重，权重无比，使司马懿篡位的野心有所滋长。但是曹爽是魏之宗室，魏之肺腑，是忠于魏室的一支强大力量。如果不消灭曹爽，司马懿的野心就无法得逞。由于曹爽是宗室子弟，骄淫盈溢，失于防犯，司马懿乃于嘉平元年正月趁少帝芳朝高平陵（明帝陵），曹爽兄弟皆从的时机，发动政变。先据武库，再屯兵洛水浮桥，挡住归路，迫使曹爽交出兵权，并夷其三族。曹爽的被杀，忠于魏室的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司马懿开始篡权专政，大权在握。在这次政变中，阮籍心向魏室，写了“嘉时在今晨，零雨洒尘埃。临路望所思，日夕不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咏怀诗》其三十七）诗中表现了对曹爽的惦念和对司马懿阴谋搞政变的愤慨。曹爽虽然被杀，但是忠于魏室的力量没有停止战斗。嘉平三年四月，太尉王凌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以帝幼受制于强臣司马懿，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楚王彪都许昌，以兴曹氏。司马懿

遂东征王凌，迫使王凌自杀。六月，司马懿杀楚王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阮籍写了“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沈。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咏怀诗》其五十四）。哀悼王凌和楚王彪之死；写了“周郑天下交，街术当三河。妖冶闲都子，炫耀何芬葩？玄发发朱颜，睥眄有光华。倾城思一顾，遗视来相夸。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咏怀诗》其二十七）哀伤魏诸王公被迫置于邺。正元元年二月，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发，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张缉，废皇后张氏。九月，司马师废其少帝芳。阮籍写了“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咏怀诗》其十六）。哀伤齐王芳的被废。正元二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讨伐司马师，为司马师所击败。文钦奔吴，毋丘俭走死。阮籍写了“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其三十九）。歌颂了毋丘俭讨伐司马师虽败犹荣的忠义气节。甘露二年正月，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葛诞发兵讨伐司马昭，七月，司马昭奉帝髦攻之。三年二月，司马昭拔寿春，杀诸葛诞。到此，忠于魏室的力量，已全部被司马氏所消

灭，禅代之势已不可免。为了不能坐受废辱，五年五月，少帝髦自讨司马昭。司马昭使贾充、成济弑帝。阮籍写了“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阳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蟋蟀鸣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谅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州，远游可长生”（《咏怀诗》其二十四）。表现了对少帝髦被弑的沉痛哀悼。

其次是总结了魏室衰亡的历史教训。魏室从曹丕受禅，到嘉平元年司马懿篡权专政，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为什么迅速的走向衰亡呢？阮籍诗也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是魏室雕翦枝干，不思藩屏之术。据《世说新语·尤悔》记载：“魏文帝（曹丕）忌弟任城王（名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骁勇，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曹植为东阿王），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阮籍有诗“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其七十二）。就是指斥魏室的骨肉相仇的。他哀伤任城王彰，写了“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表现了对任城王的歌颂与哀悼。如果任城王在世，司马懿的阴谋便不能得逞。所以对魏室的雕枝翦干，深为慨叹。魏氏诸侯，陋同匹夫，失掉了

宗子维城的作用，使社稷无卫，成为魏室衰亡的原因之一。

二是不能知人善用，委权异姓，错用了司马懿。阮籍“尝登广武（在河南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这两句话是借古喻今。“时无英雄”指魏文、明两帝不是英雄，不能知人善用，误用了奸而不雄的竖子司马懿。“受遗诏辅少主”，委以重任，坐视司马氏强大，形成禅代不可避免的局势。所以阮籍慨叹地说：“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咏怀诗》其四）天马，寓司马氏之姓。言天马出西极，路途遥远，谁使之来，则由于东道主引之。犹如司马懿本人臣，谁使他父子有禅代之势，也是由于魏文、明两帝未能识人，而误用之故。魏室全盛之势，忽成衰亡，推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不能知人善用，是魏室衰亡的原因之一。

三是魏帝荒淫，政治腐败，魏室的社会基础土崩瓦解，上行下效，使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竞附司马氏。魏武帝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文帝曹丕杀甄皇后，开荒淫之风。明帝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而又大治洛阳宫，选美女，杀毛皇后，荒淫无度。阮籍写了“百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径从邪路，僂佞趋荒

淫”(《咏怀诗》其十)。影射暗示明帝的荒淫,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的竞趋荒淫。上行下效,就是曹爽也是因荒淫而致败。“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咏怀诗》其十一)这首诗就是影射曹爽因荒淫而致败的情况。魏帝荒淫,不励精图治,成为魏室衰亡的原因之一。

第三司马氏父子之所以能够篡权专政,一方面由于文、明两帝不能知人善用,另一方面也由于司马懿阴险谲诈,善于伪装,以文其奸,骗取信任。所以阮籍用嘲笑代其怒骂,比兴韬其讽刺。诗中多用妾妇、男宠来比况司马懿,以状其情态。如“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咏怀诗》其二)。用二妃和交甫的关系比喻司马懿和明帝的关系,结果是“金石离伤”,说明司马懿翻云覆雨的阴险狡诈。又如“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咏怀诗》其十二)。用嬖男安陵君与楚王、龙阳与魏王的关系,以比司马懿与明帝的关系,司马懿受托孤寄命,“丹青明誓,永不相忘”,结果是阴谋篡位,司马懿之阴毒可见。

第四鞭笞并讽刺了那些不顾顺逆之理,趋炎附势,党附

司马氏之徒，如“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鹭特栖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咏怀诗》其二十六）。群鸟翩翩，喻攀附司马氏之徒的猖狂，葛草的延蔓勾连，喻司马党人的狼狈为奸。讽刺司空王祥是“世有此聋瞶，芒芒将焉如？”（《咏怀诗》其五十七）斥司空郑冲为“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咏怀诗》其七十五）表现了对司马党人的憎恶。

第五心向魏室，缅怀夷齐，托之于归隐、求仙，以示不与司马党人同流合污。在司马氏篡弑力量的强大情势下，阮籍利剑不在手，进不能消灭司马氏的力量，复兴魏室，便退而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他缅怀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咏怀诗》其十九）以示自己不攀附司马氏。“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咏怀诗》其七十四）。要追踪尧让天下而不受的巢父许由，避世隐居；进而又求仙离世，“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飏登云湄。”所有这些，不仅表示了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也表示了对司马氏的不满的政治态度。

第六从客观上认识到禅代的不可避免，但感情上又不愿禅代成为事实，表现了一种矛盾心理，和无所归宿的哀伤情绪。如“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咏怀诗》其七）。此诗前六句以四